

馬寅初先生在資金積累問題上，散布了許多錯誤的論點。他提出了一個錯誤的、不能成立的命題：“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

批判馬寅初在資金積累問題上的資產階級觀點

杜 萌 昆

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從這個命題引申出一個荒謬的結論：“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馬寅初先生要說明的問題實質上是：我國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無法建成社會主義。

我們知道，積累同消費是有矛盾的，但是在我國，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積累同消費之間，有對立的和相互制約的一面，但也有統一的和相互促進的一面。我國積累同消費之間的矛盾所以能夠解決，關鍵在於我們有優越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能夠允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在於解放了的、有着共產主義覺悟的六億人民不只是消費者，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在於我們黨在群眾中有無比巨大的威信，在黨的領導下，我們能夠戰勝任何人間的困難。但是，馬寅初先生看不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認為我國的生產力不能高速度發展，因而要提高積累是沒有希望的。他說：“雖然改變了生產關係，仍然不足以提高生產力。”生產力不能提高，財政問題自然無法解決。我們同馬寅初先生的根本分歧就在這裡。

我們認為，解決我國財政問題的最根本的途徑是發展我國的生產力。為了迅速地發展生產力，必須及

時地調整生產關係使其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只要生產力發展了，經濟發展了，財政問題、積累問題是會迎刃而解的。九年以來的財政工作實

踐，證明這是解決我國資金積累問題的一條唯一正確的途徑。

遠在1950年，當我們在財經戰線上取得了收支接近平衡、通貨停止膨脹、物價趨向穩定等巨大成就以後，毛主席就指出，這僅是我國財經狀況的開始好轉，還不是根本好轉。要獲得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在這三個條件中，毛主席把改變與調整生產關係的問題，放在首位。在這樣作了之後，不到三年的時間，我們就取得了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為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積累了資金。

由於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到了1955年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個體農業之間有着很大的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國民經濟的計劃化日益同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占有制不相容；個體所有制也束縛着手工業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在客觀上要求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於是很自然的就出現了1955年末和1956年初的三大改造的高潮。這個高潮，既為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又要求全民所有制的大工業迅速發展，於是就出現了1956年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我們都知道，這一年的工農業產值比

39.48%完成了計劃。

2. 大辦好事，開辟財源：關心生產，服務生產，在這個所里已形成風氣，特別是旺季以來，為更好的完成第四季度任務，在全體幹部中，掀起了為企業大辦好事的高潮。十月份共為企業辦好事29件，預計年底前可增加營業額1,221,412元；企業收入224,282元；稅收297,562元，在十月份內已征回3,367元。稅所幹部每到一個企業總是先問生產情況；發現問題就主動幫助解決。如給國營酒廠、副食品採購供應站、鐵路工程隊等單位解決銷貨容器；幫助閩庄磚瓦廠試制成功圍密燒磚等。他們体会到辦好事必須遵循從經濟到財政的原則，必須緊緊結合組織收入去進行。這樣才可達到發展生產，增辟財源，完成任務的

目的。

3. 內外協作，及時入庫：部分企業因搞鋼鐵生產不能按時結帳交稅，於是組織了內勤與外勤，企業與企業的全面大協作。稅所會計已往是專做內勤工作，旺季以來除堅持內部的日常工作外，每天均能抽出三分之一以上時間協助外勤到各企業單位征收稅款。負責城關市場工作的同志，由於工作範圍是以行業和經濟性質劃分的，過去征收時互不聯繫，往往形成兩個人同到一個地區去征收，往返費時很多。現在出去時互通情報，互打招呼，一人出去征收，代替別人催交和征收不是自己所管轄戶的稅款。有五個企業因會計參加煉鋼，不能按時辦理納稅手續，稅干即組織了同行業會計三人，抽出時間代為結帳計算稅款，納稅548

上年增长了16.5%，工业产值增长了31.1%（不包括手工业），取得了举世称奇的惊人成就。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收入与资金积累都大大增加了，这一年我国的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5.82%，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了62.00%！

但是馬寅初先生在1956年的7月，即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说什么：“……但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先进的生产制度（馬寅初說的先进的生产制度是指耕作制度，如单季稻，双季稻等）和先进的生产方法，虽然改变了生产关系仍然不足以提高生产力”（馬寅初：我国预算的优越性。见1956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短短的几句话，不仅说明了馬寅初先生对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窍不通，而且也说明馬寅初先生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极其不满的。誰都知道，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生产的发展从生产力的改变开始，然后才在生产关系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又积极影响生产力。我国的革命实践完全证实了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一般原理的正确性。馬寅初先生說：“虽然改变了生产关系，仍然不足以提高生产力”，无非是企图“证明”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人为的，不是由生产力性质决定的；无非是为反对三大改造制造“理論根据”；无非是支持那些說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沒有优越性的人。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1956年建設成就的取得是与生产关系的改变分不开的，决不是馬寅初先生所能抹煞掉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仅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它还有两个方面，即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根本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但是旧社会的思想意識的

元。这样就大大节省了人力，既支援了钢铁生产，也保证了税款及时入库。

4. 天天查计划，日日找税源：这个所过去是一句检查一次收入完成情况，不能掌握每日的收入情况。旺征以来，实行每天晚上碰头一次的制度，检查总结每个干部当天完成任务的情况，并安排次日工作；哪里的税还没有收，可收多少，都要作具体研究。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可以使全体同志经常掌握和了解全所以及每个人的收入完成进度，便于采取措施，加强征收。其次，集体总结当天工作，也就是检查每个人的工作成绩，从而鼓励先进，推动落后，使工作平衡发展。再次是能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细致而透彻的检查和发掘税源潜力，克服过去抓大税源而忽略小税源的

底消灭，还需要一个时间，某些同志还有“三风五气”思想作风，缺乏以平等待人的态度。这种现象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调整。整风运动就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系统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使其适合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的的运动。结果就出现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虽然改变了生产关系，仍然不足以提高生产力”的说法，不仅在三大改造还未彻底完成时是荒谬的，而且在它彻底完成以后仍然是错误的。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谁要是忽视了这个基本矛盾谁就必然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由于馬寅初先生看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抽象地谈论我国的人口问题与积累问题，所以他认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多，资金少”的矛盾。馬寅初先生的这种论调，同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悲观论，同他把人只看成是消费者是分不开的。

按照馬寅初先生的积累与消费的理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的矛盾（见“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第144页），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依靠农业的发展”（同书105页），为了发展农业“我们就必须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即电气化和机械化”（同书107页），为了使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有发达的重工业，否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进我们的农业技术”（同书107页）。

一句话，馬寅初先生认为我国农业在现有技术水平的条件下，只能渐进，不能跃进；只能依靠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不能一马当先带动工业、商业、文教事

偏向。

5. 税票不离身，哪里有税哪里征：针对企业工作紧张情况，这个所还采取了“游击战”的方法，企业什么时候有时间，税干就什么时间去征收。为了不走空路，有时则先以电话联系，约定时间带票前往征收。在企业人员忙不过来时，就代为到银行交款，如县粮食局、副食品采购供应站等16个单位，十月份应纳税款25,083元，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按期缴纳的。此外，在全体干部中还实行了四带制度，即带税收计划，检查企业纳税完成情况；带税收政策，随时随地进行宣传；带纳税鉴定，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带税票，上门征税。

业大跃进。其实，事实证明农业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不仅能够集体化，而且能够实现生产大跃进，只要我们需要和敢干，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这里关键，全在对劳动人民的看法。馬寅初先生的资产阶级立场限制了他的眼界。他看不到作为社会主人的我国劳动人民是有“叫河水让路，要高山低头”的气魄的劳动人民。他把增殖的人口看成是灾祸，说什么：“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同書151頁）。他还特别卑視組織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把他們只看成是消费者：“他們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們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用”（同書152頁），“消費多了，积累就少了”（同書151頁）。因此，他把造成那个所谓的“最大的矛盾”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多，所以消費大，积累小”（同書145頁）。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人多是好事情。毛主席說：“人多議論多，热气高，干劲大。”“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們認為人多是一件好事，是因为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因此，只要能充分发挥我們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創造性調动起来，那么生产的增長一定会大大地超过人口的增長和消費的增長，我国积累速度一定会大大地提高。

事实胜于雄辯，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国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長9%左右，同期积累增長了77%，五年平均积累率是23%。这种速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沒有过的，而且也大大超过工业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同期美国国民收入每年平均仅增長2.7%左右，而其积累率在1955年只有15.2%。今年由于工农业大跃进，我国国民收入和积累率的增長将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而将以百分之几十、成倍的增長。粮、棉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因此，今年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时候，积累也将大大提高。“今年及今后几年，根据部分人民公社的資料估算，公积金占純收入的比例，有可能提高到30%甚至40%以上”（見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今年的預算收入也有了显著的增長，截至九月底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5.7%，截至九月底基本建設投資比去年全年总和还多59.28%。这些生动的事实与馬寅初的悲觀論調，真是奇异的对比。

所有上述成績的取得都是与党的英明領導分不开

的。我們党在人民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党是我們各項事业胜利的保證。我們党能够充分利用我們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能够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与創造性調动起来，能够在各个时期提出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項方針。財政工作如果离开或者削弱了党的領導，就必然要犯各种各样的錯誤。但是在馬寅初先生的眼里，党的領導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他的洋洋数千言的財政与积累“理論”中，只字未提党的領導作用。

我們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有6亿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民，有英明的共产党的領導，財政問題，資金积累問題已經得到解决，今后还将取得更輝煌的成績。1958年就是最好的証明。由于党領導进行了整风运动，調整了人民內部的关系，調动了人民的积极性，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財政收入，資金积累都以人們設想不到的速度在飞跃。根据今年1—6月份的統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長34%，农业仅夏收作物即比去年同期增長69%，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25%，而基本建設投資則增長了88%。下半年将有更大幅度的跃进。由于上述这一切，建成社会主义已經不是遙远的事情了。但是馬寅初先生却看不到我們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把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只看成是消费者，同时看不到党的領導作用，因此积累同消費在他的笔下成了絕對对立的東西，而生产水平低人口增殖快也是无法解决的矛盾。馬寅初先生在1958年的近著中还聳人听聞地說：“資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可否把消費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險性的”（同書151頁）。一方面我国是“每人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低得可怜，”积累比重不能提高；另一方面减少消費、增加积累是“带有危險性的”，“不免会出乱子的”。說來說去，我国依靠自身积累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不堪設想的。这种論調是毫无根据的，完全荒謬的。毛主席在18年前已經指出：“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今天国际、国内的事实完全証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論断。

中国人民正以冲天的干劲，豪迈的气概，为建設社会主义不断地創造新的奇迹，馬寅初先生的资产阶级观点在事实面前已經彻底破产。